

从伙伴到陌路： 角色视角下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衰变*

舒伟超 柯 研

摘 要：能源问题是俄欧互动中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角色理论视角，对后冷战时代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基础，结合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两个核心变量，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炼出六项影响因素，即与角色定位相关的政治文化、能源战略与能源集团，以及与角色期待相关的历史传统、国际危机与能源革命。本文认为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进具有三个特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同俄欧关系的一致性、因政治文化差异形成的角色期待空想性，以及非对称性结构对能源合作的制约性。当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陷入停滞状态，俄欧能源合作呈现碎片化态势。

关键词：角色定位； 角色期待； 能源对话机制； 俄欧能源关系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1620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1620

中图分类号：D815.2； F416.2； 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4)01-0046-24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构建‘后西方世界’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0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德国研究》编辑部提出的宝贵建议和编辑老师细致的校对,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本文文责自负。

一、问题的提出

能源合作是俄欧经济合作的关键领域，双方在能源领域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对俄欧关系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国内外关于俄欧能源关系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涉及能源安全、能源政策、能源外交和能源战略四个部分。^① 就研究范式而言，既有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分析视角。第一，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该视角将能源视为物质权力的资源或基础，相对物质权力的增加会导致一国对外政策活动的野心增加和范围扩展。^② 这一理论视角的假设是，资源稀缺和相对收益会导致国家间争夺能源资源的地缘政治博弈。因此，这一理论视角通常被用于分析俄欧能源关系中生产国、过境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博弈，将能源的地缘政治属性同能源安全问题相关联。^③ 例如，2000—2008年的国际油价高涨赋予了资源储备丰富的俄罗斯极大的能源权力，并且俄罗斯能源战略的政治色彩越发浓烈，因而，欧洲对俄罗斯在能源方面的非对称依赖会使自身面临能源安全威胁。^④ 第二，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该视角强调，通过国际机制（制度）管理相互依赖关系，不仅可以防止国家间能源关系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可以有效促进相互依存下世界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⑤ 相关研究认为，俄罗斯、欧盟和乌克兰在能源链条中的利益相互交织，国家和地区间相互依赖增强，从而创造了国家和地区对制度的需求，在彼此共同需要的条件下，能源利益交织有助于催生国际合作机制，以应对与能源相关的具有经济属性特征的矛盾。^⑥ 诚然，这一视角并不是指相互依赖就能促成合作，相反，当相

① [俄]斯·日兹宁：《俄罗斯能源外交》，王海运、石泽译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5页；富景筠：《俄罗斯能源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祝佳：《欧盟能源政策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②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2, here p. 167; 富景筠：《俄欧天然气定价权博弈探析》，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第87—102页，这里第90页。

③ [英]戴维·维克托、埃米·贾菲、马克·海斯：《天然气地缘政治——从1970到2040》，王震、王鸿雁等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④ Dominique Finon/Catherine Locatelli, “Russian and European Gas Interdependence: Could Contractual Trade Channel Geopolitics?”, *Energy Policy*, Vol. 36, 2008, pp. 423—442, here p. 425; Karen Smith Stegen, “Deconstructing the ‘Energy Weapon’: Russia’s Threat to Europe as Case Study”, *Energy Policy*, Vol. 39, 2011, pp. 6505—6513, here p. 6505.

⑤ 方婷婷：《能源安全困境与俄欧能源博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5期，第125—139页，这里第127页。

⑥ Elena Kropatcheva, “Playing Both Ends Against the Middle: Russia’s Geopolitical Energy Games with the EU and Ukraine”, *Geopolitics*, Vol. 16, 2011, pp. 553—573, here p. 553; Tatiana Romanova, “Russian Energy in the EU Market: Bolstered Institutions and Their Effects”, *Energy Policy*, Vol. 74, 2014, pp. 44—53, here p. 44.

互依存集中在一个领域,而非多领域的复合相互依赖时,安全紧张局势便会加剧。有研究表明,欧盟与俄罗斯的相互依存领域过于单一,仅表现在能源方面,这样可能会加剧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紧张关系,导致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对峙的竞争性外交战略,进而在能源问题领域遏制双方的合作,^①造成能源对话机制很难有效开展。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该视角突破了以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传统分析范式,从跨国公司视角探讨俄欧能源关系演变的商业利益逻辑。有学者指出,德法意等主要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正在被欧洲各国国内能源财团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下文简称“俄气”)之间的紧密关系所塑造。^②第四,建构主义视角。该视角强调身份、认知、规范和文化的的作用。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能源过境最终成为行为体间的冲突来源还是合作成果,依赖于一国如何看待自己的能源地位以及如何通过能源贸易构建国家身份。^③在一系列研究成果中,除了部分学者重点考察波罗的海三国对国家身份和能源安全的认知对于自身同俄罗斯能源关系的施动,还有学者从政治精英的认知角度出发,将政策制定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念视作影响国内决策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就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态度转变对俄罗斯东部天然气战略实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④

表1 国际关系视野中对俄欧能源关系的研究

分析视角	主要研究方法	主要观点
新古典现实主义	地缘政治学、博弈论(国家层面)	资源稀缺和相对收益引发能源的地缘政治博弈
新自由制度主义	新区域主义、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有效促进能源领域的区域(国际)合作
国际政治经济学	市场与权力互动博弈论(非国家层面)	大型能源企业引起能源政治的结构变化
建构主义	身份认同、国家角色	国家角色认知与国际规范影响国家间能源关系

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1所示,不同的理论视角涉及的研究内容有所差异。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这一机制可以视作俄欧能源合作的主要模式,其发展历程可以体现俄欧关系的走向。基于当前分析视角的梳理,本文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俄欧能源对话机制为何衰退甚至走向停滞,以至于双方关系走向陌路。俄欧双方有着何

^① Andrej Krickovic, “When Interdependence Produces Conflict: EU-Russia Energy Relations as a Security Dilemm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6, No. 1, 2015, pp. 3 – 26, here p. 4.

^② Pavel K. Baev/Indra Overland, “The South Stream versus Nabucco Pipeline Rac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Rationales and Political Stakes in Mega-Projec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6, No. 5, 2010, pp. 1075 – 1090, here p. 1081.

^③ Andrei P. Tsygankov, *Pathways after Empi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World*,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pp. 6 – 8.

^④ Miroslav Mares/Martin Larays, “Oil and Natural Gas in Russia’s Eastern Energy Strategy: Dream or Reality?”, *Energy Policy*, Vol. 50, 2012, pp. 436 – 448, here p. 438.

种互相认知与定位？俄欧能源对话合作机制的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如何？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采用归纳与演绎法，对涉及双方的能源政策以及合作条约进行归纳与解读，由此推导出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现状，并结合欧洲秩序这一大前提，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进行分析。在理论视角方面，本文采取角色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角色理论并非一片空白，从既有文献来看，有学者提出“角色—理性—行为”的分析框架解读对外政策。^①具体到两国关系上，有学者试图用角色理论分析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分别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次探讨了影响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中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变化的因素。^②与此同时，角色理论还成为了分析国际合作的重要视角，如从角色理论出发研究北极理事会这一组织及其作用。^③虽然角色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着诸多尝试，但在俄欧能源问题研究方面，国内研究较少将角色视作重要影响因素。^④因此，本文努力尝试从角色理论出发，解读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变过程，在进一步阐述这一机制演变特征的同时丰富相关的研究视角，深化俄欧关系研究。

二、角色理论的相关概念与分析框架

在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角色是在自我身份定位与外部他者期望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国家角色的形成具有主体间性。在角色的塑造过程中，自我身份定位与他者期待的相互作用成为了角色塑造的关键因素。在国际行为体之间，自我身份定位与他者期待的趋同可能促进行为体间的相互认同并推动合作。与之相反，行为体之间的差异则可能导致角色矛盾激化，进而引发一系列的国际冲突。为了深入理解俄罗斯与欧盟能源对话机制的发展脉络，本文选择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这两个核心变量加以考察，力求分析出影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进程的因素。

（一）概念阐释

角色起初是戏剧舞台中的用语，指演员在舞台上按照剧本的规定所扮演的某一特定人物。在社会心理学中，乔治·米德（George H. Mead）最早将角色这一概

① 桑溥：《角色·理性·行为：国家对外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9年，第3页。

② 徐博、[美]威廉·瑞辛格：《国际关系角色理论视角下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探析》，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4期，第98-111页，这里第98页。

③ 孙凯、李文君：《角色理论视阈下的北极理事会及其作用研究》，载《边界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第46-62页，这里第47页。

④ 参见毕洪业：《乌克兰危机下的俄欧政治与能源关系走势》，载《国际石油经济》，2014年第4期，第7-12页；陈小沁：《解析乌克兰危机下俄欧能源合作的困境与趋势》，载《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4期，第48-56页；冯玉军：《国际能源战略格局新变化与中俄能源合作》，载《欧亚经济》，2018年第3期，第1-8页；董一凡：《欧俄能源合作中的大国博弈》，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第89-107页；等等。

念引入,分析并揭示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行为。^①而在国际关系领域,20世纪70年代,首次将角色理论运用到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解释的是卡列维·霍尔斯特(Kalevi J. Holsti),他将国家角色划分为17个类型,认为国家角色行为受到其他国家的态度以及对策的影响;而角色定位则通过政策制定者来表达,包括对国家身份的主观认识以及如何理解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②20世纪80年代之后,斯蒂芬·沃克(Stephen G. Walker)进一步将角色理论视作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层理论”,对角色理论分析中的施动者(国家)和结构(体系)两个抽象概念进行具体归纳,总结出6种国家角色类型。^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角色理论的价值又被重新挖掘。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角色是身份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双重性质。角色的一部分通过自身在体系中与他者的互动形成,另一部分则在与体系中的行为体互动之前就已经形成,角色身份是国家内在属性的表达与国际互动共同塑造的产物。^④在角色理论中,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这两个核心概念尤为重要。所以在理解国家角色时,需要考虑国家自我身份定位和体系中的他者期望这两方面因素。本文将国家角色定义为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国家或超国家行为体设法满足角色期望和实践,以符合体系期待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

国家的角色定位表达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诉求,即国家如何认识自身的角色,并努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同。聚焦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该机制涉及俄罗斯和欧盟在该机制中的自我身份定位以及各自对俄欧合作平台的认知。影响一国角色定位的直接或间接因素颇多。对于所述的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而言,内生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文化、能源战略以及能源集团。而外部行为体对国际体系中角色认知与责任的期待则被称为他者角色期待,这些期待主要受历史传统、国际危机以及能源革命等因素的影响,在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理论框架

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之前,本文提出两点假设。首先,在俄欧能源对话机制上,本文认可欧盟内部主要大国的推动作用,但更倾向于将欧盟视为一个在对外关系中的独立整体。一方面,考虑到欧盟的高度一体化程度以及近年来欧盟战略自主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指出欧盟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扮演重要角色,特别

① [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② Kalevi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70, pp. 233 - 309, here p. 234.

③ Steven Walker,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1987, pp. 3 - 5.

④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是在外交、贸易以及国家、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方面。^①另一方面,尽管欧盟各成员国对待该组织的内部认知和外部期待存在差异,但在涉及与俄罗斯就能源议题上展开对话合作时,各成员国的关切却十分相似。其次,在考察影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演进的因素时,本文从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这两个核心变量出发,推导出了三组对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尽管地理环境、欧盟内部部分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外部国际舆论环境等因素也对能源对话机制产生影响,但它们并非主要因素,且与本文的角色理论框架核心变量不相适应,因此不作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将对俄欧关系的整体考察与影响因素的选择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和前提,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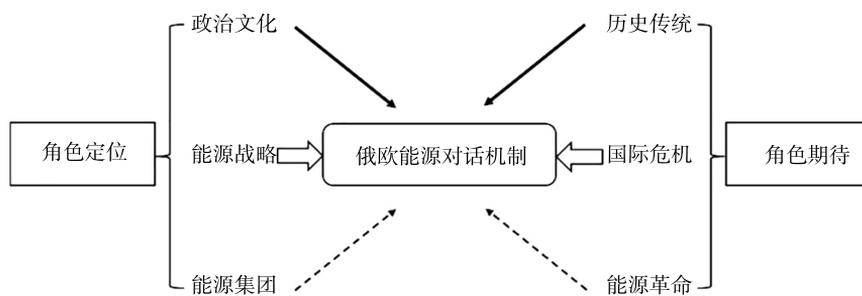


图1 角色视角下的俄欧能源对话机制

注：实线箭头表示长期性作用，指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因素从根源上影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共同造成俄欧能源安全困境；空白粗箭头表示中期性作用，指能源战略与国际危机直接影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虚线箭头表示短期性作用，指能源集团与能源革命间接影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开展。

来源：作者自制。

角色定位可以作为探究俄罗斯与欧盟在能源外交与政策上行为合理性的工具。其中影响因素的选择主要应从国家或超国家行为体的层面进行分析。首先，政治文化对国家的政治外交、战略决策具有深远影响，是基础性、长期性的。能源不仅是经济贸易资源，更是战略资源。有大量研究认为，能源是俄欧关系的重要保障，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②双方各自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国家的身份定位、历史叙事、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影响了能源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对经历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欧盟来说，欧洲的政治文化是在三种文化形态演进的过

^① 参见赵光锐：《欧盟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角色与挑战》，载《南大亚太评论》，2018年第1期，第188-245页；张健：《美俄欧中互动：欧盟角色及其政策取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2期，第10-17页；于芳：《法德联合领导下的欧盟战略自主——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载《法国研究》，2022年第1期，第88-104页；赵怀普：《欧盟在中美欧互动中的多重角色与中欧关系》，载《国际论坛》，2023年第4期，第101-119页；等等。

^② 徐光辉：《新世纪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21年版，第125-126页。

程中形成的,表现为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自由主义、平等思想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这也与欧盟呼吁能源领域的自由化相呼应。对俄罗斯来说,除了因东正教信仰而在宗教上与西欧国家不同,其自身对圣愚的崇拜也推动着整个国家对整体主义的推崇,由此在文化方面与西欧国家形成了较大差异,进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异于西欧国家的欧亚主义,将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视作地缘“森蚺”。^① 双方开始互动之前,各自的政治文化已经影响着信任的建立,这不利于在能源领域的战略互信的建立及合作的有效展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缺乏政治信任就不能进行对话合作,而是强调了政治文化对国家角色定位的重要性。历史传统尽管对此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对于短期能源对话机制的影响仍有限。双方的角色互动仍然会影响政治文化,进而影响双方的角色定位。因此,下文将不再赘述这一要素。

其次,能源战略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具有中期的决定性作用。对俄罗斯来说,能源对话机制是其对欧政策的表现之一,主要受制于俄罗斯的对外整体战略构想与能源外交战略的演变。并且,战略以及政策的制定与俄罗斯的对外决策机制紧密相关。^② 对欧盟来说,能源对话机制主要受制于《欧盟宪法条约》与欧盟能源战略绿皮书。根据规定,欧盟享有专属权能、共享权能、协调与补充权能,而能源属于欧盟与成员国共享权能领域。^③

最后,能源集团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具有次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在经济层面,能源集团作为俄欧能源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其经济活动和利益直接关系到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运行和成果。在政治层面,能源集团尽管并非政策制定者,但往往与各国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可以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和外交政策,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产生间接影响。例如,能源集团可以通过游说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等方式,推动政府在对话机制中采取更加积极和灵活的政策,以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在能源集团中,天然气能源集团的作用更大,^④其中俄气可

① 圣愚,俄文“юродство”,原指基督教教义中的“为基督故而愚拙”。在俄罗斯文化中,圣愚形象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是文学、艺术和哲学作品中的常见元素,又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符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圣愚形象展现了对人性和道德的深刻洞察,同时又呈现出天真和幼稚的一面。艺术家们通过绘画、雕塑等形式,描绘了圣愚的形象,表达了对人性、信仰和生活意义的思考。在哲学领域,俄罗斯圣愚形象代表了一种超越常规理性的智慧,体现了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对世俗世界的颠覆。综上所述,圣愚在俄罗斯文化中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代表了对超越常规认知的追求和探索。参见:[美]埃娃·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页;[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于宝林、杨冰皓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② 初冬梅:《当代俄罗斯国家决策机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页。

③ 曾令良:《欧洲联盟法总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④ Thane Gustafson, *The Bridge: Natural Gas in a Redivided Europ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6-8.

对俄罗斯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① 其一，俄气有着巨大的海外利益，庞大的海外资产和份额使其高度关注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特别是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其二，天然气出口额在俄罗斯出口贸易额中位居前列，俄气作为全球最大天然气公司，在俄政策制定中具有巨大影响。^② 其三，俄气在俄政府中有着强有力的靠山。与俄罗斯相比，欧盟情况更为复杂。第一，欧盟各成员国在能源消费的结构和特征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第二，欧盟一直在推动制定共同能源政策、形成高效使用能源的“行动计划”、建立新的欧洲级的能源管理机构，但各国对此难以达成有效共识。从上述两个原因可知，影响欧盟对俄能源对话机制的企业主要是各成员国的能源巨头，如德国的天然气巨头尤尼珀(Uniper)、德国电力集团意昂(E.ON)，法国的天然气公司(Gaz De France)与昂吉集团(Engie)，等等。就俄欧天然气贸易而言，天然气管道较高的基础设施成本和资产专用性，使得垄断势力控制着从生产到终端消费的整个供应链环节。^③ 从某种意义上讲，俄欧天然气定价更多的是双方垄断结构下大型能源企业的谈判结果。

角色期待强调国际体系对于行动者角色的认知以及对其外交行为的期待，主要由角色互动而形成，因此影响因素主要应该从体系层次进行分析。首先，俄罗斯与欧盟各成员国长期的历史实践互动并未使双方形成战略互信。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大致经历了基辅罗斯、钦察汗国、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发展阶段。^④ 俄罗斯社会除了在蒙古统治阶段和苏联前中期，其余阶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欧洲化”进程。可以说，“欧洲化”始终贯穿于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⑤。历史记忆从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俄罗斯对欧洲的角色期待。尽管俄罗斯内部有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争执，但俄罗斯总体上还是希望融入西方并与西方发展伙伴关系的，这在沙皇帝国时期的彼得大帝改革、苏联后期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欧洲化”思潮中都有所体现。尽管当前俄罗斯对欧盟的外交政策与能源战略有

① 冯玉军：《欧亚新秩序（第二卷）：俄罗斯转型：对外政策与中俄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页。

② 参见 Trend Economy，<https://trendeconomy.ru/data/h2/Russia/TOTAL>，2023-05-06，访问日期：2023-10-09；“The Top Natural Gas Companies in the World”，Investopedia，2023-07-18，<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markets/030116/worlds-top-10-natural-gas-companies-xom-ogzpy.asp>，访问日期：2023-10-09。

③ 徐斌：《市场失灵、机制设计与全球能源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78-95页，这里第81页。

④ 季志业、冯玉军：《一波三折俄罗斯人》，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⑤ [俄]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刘文飞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很大调整,但其仍无法彻底摆脱长期西向的历史惯性。与俄罗斯不同,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一方面,从文明史的角度考察,“西方文明八个特征表现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文明发展历程无缘”^①。由于在20世纪前,西欧国家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大得多,因而西欧人在俄罗斯人面前有天生的优越感,就连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历史进程的“欧洲化”改革在西欧人眼中也是一个“丑陋的怪胎”^②。另一方面,西欧人在轻视俄罗斯文明的同时,对俄罗斯势力增强怀有强烈不安,复杂的情感导致了其对俄政策的摇摆不定。西欧在某些特定时刻想把俄罗斯作为追随者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更多时期则是将俄罗斯视为对手甚至敌对力量。西欧国家一贯认为,“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知道有所节制。一旦受阻它便满怀悲愤,暂时隐忍,伺机报复。在19世纪上半叶是对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是对奥地利,在柏林会议后是对德国,在冷战期间则是对美国”^③。这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对苏联的恐惧使西欧人意识到“不能靠零零星星的举措,而只能靠美国的长期政策对其予以有效反击”^④。即使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下滑的今天,西方仍没有放松警惕。在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构建过程中,为保障自身安全,欧盟加快了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出于同样目的,俄罗斯也不断努力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双方都缺乏安全感以及将对方视作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感,由此产生了能源安全困境。由此可见,双方的历史传统互动没有形成良好的正面效应,使得双方能源合作受限。由历史传统引发的角色期待是长期实践的结果,因而下文也不再过多赘述这一因素。

其次,国际危机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具有关键性作用。本文所指的国际危机不是宽泛的历史学、经济学或军事学概念,主要是指与全球治理及国际秩序密切相关的重大危机,是国际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国际政治社会学概念。^⑤严重的大危机可以影响大国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影响国际局势走向。21世纪以来的国际危机主要有2001年“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俄格战争、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2022年的俄乌冲突。其中,乌克兰危机与俄乌冲突属于地缘政治危机,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具有中期影响。俄罗斯、欧盟与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② 冯玉军:《欧亚新秩序(第二卷):俄罗斯转型:对外政策与中俄关系》,第134页。

③ [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④ [美]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⑤ 郭树勇:《大危机下的国际合作与外交转向: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第20-28页,这里第23页。

天然气过境国乌克兰之间的能源关系构成了生产、消费与过境的三方博弈。俄欧能源主要围绕天然气贸易，而天然气因为能源供求关系和过境国的特殊性又被赋予了战略意义。因此，在分析俄欧能源关系时，天然气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地缘政治属性需要被同时考虑在内，本文将乌克兰危机与俄乌冲突看成重要影响因素，且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进具有冲击效应。

最后，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可能在未来重新塑造俄欧能源关系。其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页岩气革命”可能改变欧洲天然气的供给结构，使液化天然气成为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重要替代。自2019年起，欧洲对俄天然气进口量呈现波动下滑趋势，俄乌冲突爆发后，2022年1—11月期间，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进口）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不到四分之一，来自美国、卡塔尔和尼日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占25.7%。^①其二，“页岩气革命”还改变了美国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话语权。自2011年起，美国便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这削弱了俄罗斯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上的定价权。^②

在本文提出的六项影响因素中，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由于其基础性作用，在迄今的研究中提及较多，并且常被众多学者用作解读俄欧关系的核心因素，^③本文承认这两个因素的长期性作用。但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反映的是双方中、短期的能源合作关系，因此它的具体发展历程主要还是受到能源战略、能源集团、国际危机与能源革命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重要性不同，甚至不会同时发挥作用或者保持不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能源战略与国际危机这两个因素。

三、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发展历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与欧盟便围绕能源问题开展接触。依据双方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表态以及国际秩序的演变，以双方共同签署的法律文件与国际重大事件为节点，可将俄欧能源对话机制主要分为萌芽、成长与停滞三个时期。

^① The Council of the EU and the European Council, “Infographic — Where does the EU’s Gas Come from?”, 2023-02-07,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infographics/eu-gas-supply/>, 访问日期: 2023-10-09。

^② 参见“The U. S. Leads Global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with Record Growth in 2018”, U. 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9-08-20,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40973>, 访问日期: 2023-10-09。

^③ Roger Eatwell, *European Political Cultures: Conflict or Convergence?*,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3-5;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 2-3.

(一) 萌芽时期

冷战结束后,1991年俄罗斯联邦独立以及1993年欧盟成立都标志着欧洲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俄欧能源关系也由此重新调整,这为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1994—2000年是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形成的萌芽时期。该时期的双方能源合作处于初步提升阶段。结合北约发布的《俄罗斯在欧洲能源市场上的影响》报告,如表2与表3所示,1992—1995年,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量逐年递增,对西欧的天然气出口量多于东欧多且增幅较大。与此同时,俄罗斯对部分原苏联国家天然气出口量呈下降趋势,对乌克兰出口量的比重下滑明显。

表2 1992—1995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量

地区	年份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西欧		60.72	62.00	67.10
东欧		33.94	33.90	33.73	40.30
中东(以土耳其为主)		4.44	5.00	4.97	5.70
总计		99.10	100.90	105.80	117.40

注:单位为10亿立方米。

来源:Alexander A. Arbatov, “The Role of Russia on the European Energy Market”, NATO, 1997, <https://www.nato.int/docu/colloq/1997/97-3-3.htm>, 访问日期:2023-10-09。

表3 1992年与1995年俄罗斯对部分原苏联国家天然气出口量

国家	1992年	1995年
乌克兰	77.6	52.8
白俄罗斯	17.7	12.9
摩尔多瓦	3.4	3.0
哈萨克斯坦	1.7	0.0
爱沙尼亚	0.9	0.7
立陶宛	1.6	1.2
拉脱维亚	3.2	2.5
总计	106.1	73.1

注:单位为10亿立方米。

来源:Alexander A. Arbatov, “The Role of Russia on the European Energy Market”, NATO, 1997, <https://www.nato.int/docu/colloq/1997/97-3-3.htm>, 访问日期:2023-10-09。

就俄罗斯而言,苏联解体后,在“历史终结论”的鼓噪中,俄罗斯通过快速推行完全西化式改革,对外政策上倒向西方。亲西方主义者致力于形成一种不同于斯拉夫派和欧亚主义的独特战略。他们强调,俄罗斯是绝对的欧洲国家,必须选择西

方世界及其体制。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德米特里·特列宁(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指出,俄罗斯正处于后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甚至前现代社会边界之间,唯一理性的选择应该是强调俄罗斯的欧洲特征,使其深入地融入欧洲。^① 亲西方思想在俄罗斯独立初期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前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前外交部部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озырев)、前总理叶戈尔·季穆洛维奇·盖达尔(Егор Тимурович Гайдар)及前国务秘书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利斯(Геннадий Эдуардович Бурбулис)等都是这一思想的重要支持者。^② 与此同时,寡头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坛最具显著的特征之一,作为“俄罗斯七寡头”之中的能源寡头,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霍多尔科夫斯基(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有着明显的亲西方特征,例如,其在2001年建立了开放俄罗斯基金会,旨在促进俄罗斯同西方世界的联系。^③

就欧盟而言,两极格局瓦解为欧盟东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欧盟面临的防务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防范苏联转变为保持内部稳定。在对俄政策上,欧盟主要以“防范+接触”为主。从对俄罗斯发展前景无从把握而又力图对其转轨施加影响的立场出发,欧盟一方面支持美国以北约东扩为手段,将前华约成员国纳入北大西洋防御体系以威慑俄罗斯;另一方面以积极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为手段,推行西方价值观和制度,试图影响俄罗斯改革方向。^④ 比如,1999年6月,欧盟科隆首脑会议通过了“对俄罗斯共同战略”,明确提到“未来的俄罗斯将成为整个欧洲大陆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对欧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⑤ 这一战略表明,欧盟愿意帮助俄罗斯融入欧洲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区域。在能源政策上,20世纪90年代,为确保能源稳定供应,欧洲国家积极投资高回报的能源项目,并倡议签署全欧能源政策基本文件——《欧洲能源宪章》,俄罗斯也完成了《欧洲能源宪章》的签署工作。在欧盟看来,与俄在能源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减少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政治上不稳定的波斯湾国家石油进口依赖的替代方案。

^① Dmitri Trenin, *The End of Eurasia: 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Moscow: Carnegie Moscow Center, 2001, p. 319.

^② 刘军、毕洪业:《俄欧关系与中国欧亚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③ “What Is Open Russia?”, Khodorkovsky, <https://khodorkovsky.com/what-is-open-russia/>, 访问日期:2023-10-10。

^④ 毕洪业:《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机制构建及前景》,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1期,第51-56页,这里第52页。

^⑤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mmon Strategy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Russia”, 1999-06-0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31999E0414&from=FR>, 访问日期:2023-08-05。

从1992年俄罗斯联邦战略构想来看,俄罗斯对欧盟赋予了角色期待,视欧盟为逐渐形成的合作伙伴,并试图将俄罗斯经济充分融入欧盟市场和经济体系。^①这一路线也得到了欧盟的积极回应,欧盟也将俄罗斯视为合作伙伴。在经济合作上,能源领域的相互依赖推动了1994年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1997年生效),并签订了能源出口协议,其中的第七部分第61条、第65条、第66条明确了双方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的主要形式和方向。^②从2000年俄罗斯联邦战略构想来看,俄罗斯对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扩张反应也不激进,甚至将欧盟视为“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之一”,并努力与之发展稳固、持久、不受外部波动影响的合作关系。^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0年10月底至11月初的巴黎峰会赞同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提出的倡议,即“同俄罗斯就大量增加对欧盟能源供应,以换取欧盟对俄罗斯的投资和技术合作而开展对话”。^④这一倡议得到了双方的积极回应,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了《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确定了双方在能源领域合作的总体规划和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以提高能源合作的可靠性。

将表2与表3结合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冲击,但由于俄自身巨大的天然气储量以及统一天然气供应系统,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在俄罗斯诸多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⑤因此在面对国内投资危机时,俄罗斯在降低对部分原苏联国家的天然气供应的同时,加强了对西欧的天然气供应,借此缓解国内压力。由于俄罗斯这一举措符合欧盟的天然气需求,因此这一时期俄欧双方的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相适。即便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俄欧能源合作总体上受到的冲击仍较小。1999年,欧洲理事会通过《欧盟对俄罗斯共同战略》,旨在加强欧盟与俄罗斯在新世纪初的战略伙伴关系。^⑥因此,基于1999年整体平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2,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files/1993%20Foreign%20Policy%20Strategy%20RUS.pdf>, 访问日期:2023-08-05。

②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артнёрств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Россией 1994 г.,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ю. н. Каливинченко П. А., <https://eulaw.edu.ru/spisok-dokumentov-po-pravu-evropejskogo-soyuza/soglashenie-o-partnerstve-i-sotrudnichestve-mezhdu-es-i-rossiej-1994-g/>, 访问日期:2023-08-05。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0,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0-07-11, https://www.ng.ru/world/2000-07-11/1_1_concept.html, 访问日期:2023-08-05。

④ Romano Prodi, “2000-05: Shaping the New Europe”, Strasbourg, 2000-02-15, <http://aei.pitt.edu/66298/1/1.2000.pdf>, 访问日期:2023-08-05。

⑤ Alexander A. Arbatov, “The Role of Russia on the European Energy Market”, NATO, 1997, <https://www.nato.int/docu/colloq/1997/97-3-3.htm>, 访问日期:2023-10-09。

⑥ “Common Strategy of the European Union of 4 June 1999 on Russia”,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9-06-24,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38943c06-7e5d-4ca3-acc3-c5154bd9c04e/language-en>, 访问日期:2023-10-10。

稳的俄欧关系，以 1994 年《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与 2000 年《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签署为重要的标志，这一阶段俄欧的互动可看作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形成的开端。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俄欧在角色定位中将彼此视为能源合作伙伴。在双方政治文件中，明显可以看到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都是积极的，冷战结束、外交政策与能源战略调整可以视为欧俄双方互动中的积极因素，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确立以及双方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成长时期

从 2001 年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正式建立到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欧能源关系合作与冲突并存。在这一阶段前期，相关机制建设较快，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从 2008 年后，双方对话机制发展较慢，就整体趋势而言，由合作为主逐步滑向冲突。按照特征来看，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01—2008 年，双方合作顺利，对话机制稳步发展甚至较为成熟。2000 年 10 月俄欧巴黎峰会召开，双方同意优先在能源领域推进合作，将双方关系提升为能源战略伙伴关系。^① 2001 年 11 月，俄欧签署了《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俄欧经常性的能源对话正式形成，由此确定了双方能源合作总体规划。^② 2002 年 5 月，在俄欧首脑峰会上，双方决定成立俄欧能源技术中心，在俄罗斯实施节能试验计划并共同建立能源战略储备。双方在共同签署的《能源合作声明》中指出，俄罗斯拥有优先进入欧洲能源市场的特殊权，^③这标志着俄欧能源对话的正式启动。随着双方在能源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入，俄欧能源合作内涵被不断丰富。在 2008 年 6 月曼西斯克峰会上，俄欧就减少政治因素对合作的影响达成共识，而欧盟也获得了讨论俄欧关系新协定的授权，^④双方能源关系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总体来讲，从这一阶段双方的互动历程看，能源对话机制主要取得了四点成效：一是俄罗斯对欧盟出口燃料能源总量稳定增加。二是能源对话有利于解决 2004 年欧盟东扩后能源在东欧地区的自由转运问题。三是双方共同筹划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早在 2001—2002 年，双方就确定能够“反映相互利益的项目方案”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建设北欧天然气管道、整合“友谊”和“亚得里亚”石油管道、研究

^① ЭнергодIALOG Россия-Е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minenergo.gov.ru/node/14646>, 访问日期:2023-10-10。

^② 冯玉军、丁晓星、李东：《俄罗斯新能源外交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 9 期，第 17—22 页，这里第 20 页。

^③ Russia-European Union Summit Joint Statement, Moscow, 2002-05-29, 9424/02 (Presse 171), p. 3.

^④ 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11th EU-Russia Summit in Khanty-Mansiysk in June 2008”, B6-0299/2008.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B-6-2008-0299_EN.html?redirect, 访问日期:2024-01-15。

托克曼天然气产地以及开发利用亚马尔的综合方案等。^①四是双方将进一步构建在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技术支持等方面相互依存的体系。虽然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但是平静的俄欧关系下依旧暗流涌动。2006年,俄欧赫尔辛基首脑峰会就新的俄欧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展开协商。然而,波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否决了新协议,^②在使得俄欧谈判陷入停滞的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欧盟内部的不一致,这也为下一阶段的诸多问题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是2008—2014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俄格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双方能源对话机制围绕预警防控机制展开。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双面效应,一方面阻碍了俄欧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促成俄欧双方的能源合作。在这一阶段,俄欧双方多次举行峰会,共同探讨金融危机、能源形势以及双方的能源安全等问题。因此,金融危机对俄欧能源合作负面效应甚小。这一阶段推动欧盟对俄罗斯角色期待发生转变的事件是俄格冲突与乌克兰危机。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发生能源争夺,欧盟的能源供应受到巨大影响。俄罗斯动辄以“断油”和“断气”为由对天然气进口国进行威胁,也使得欧盟对俄罗斯作为“能源安全担保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③2009年,欧盟批准了内部能源市场第三批一揽子能源政策,主要针对欧盟天然气和电力市场进行改革,以避免大型能源生产企业控制输送网络。^④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不利于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在欧洲从事天然气的运输与销售,也极大地阻碍了俄能源业务在欧盟成员国的发展。在2009年11月斯德哥尔摩峰会上,俄欧双方就能源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达成谅解,并决定建立早期预警防控机制,从而确保能够尽早评估能源供应存在的潜在风险与问题,^⑤这也是双方能源对话在金融危机和俄格冲突背景下迈出的艰难一步。

与俄格冲突相比,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更是使得俄欧关系急转直下,也给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蒙上了阴影。乌克兰危机令俄欧关系发生改变,俄欧双边政治关系不断恶化,下降至冷战后的冰点,双方能源合作也因此受到巨大阻碍。如保加利

① 陈新明:《俄罗斯对欧盟能源政策的立场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6期,第94—105页,这里第96页。

② “Russia: Poland Holds Up EU Partnership Talks”, Radio Free Europe, 2006-11-24, <https://www.rferl.org/a/1072720.html>, 访问日期:2023-10-11。

③ 成健:《俄欧关系——以能源合作为向度》,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12—18页,这里第17页;斯蒂芬·赫德兰、李承红:《危机中的俄罗斯:一个超级能源大国的终结》,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2期,第40—64页,这里第53页。

④ 岳小文:《俄罗斯与欧盟:能源对话十年》,载《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2期,第64—71页,这里第60页。

⑤ 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2 November 2009 on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EU-Russia Summit in Stockholm on 18 November 2009”, 2009-11-1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7-2009-0064_EN.html, 访问日期:2023-10-11。

亚暂停“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八国集团首脑峰会被取消等。^① 在俄罗斯与欧盟的能源合作对话机制进展受阻的同时，欧盟开始主动改变自身的能源战略和政策，追求能源来源的多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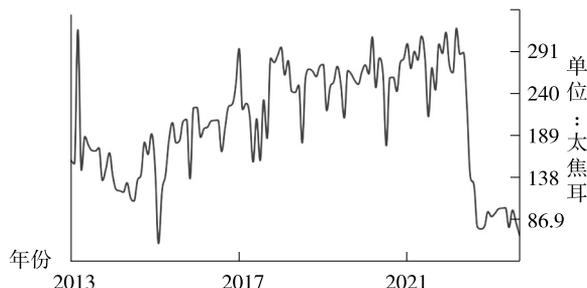


图 2 2010—2023 年欧盟进口俄罗斯天然气走势图

来源: Trading Economics, “European Union Natural Gas Imports From Russia”,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european-union/natural-gas-imports-from-russia>, 访问日期: 2024-01-15。

就上述阶段的影响因素来说，国际金融危机与俄格冲突对俄欧双方角色期待的影响较小。从 2010 年第 25 届俄欧峰会上欧盟发布的文件内容来看，欧盟仍然将俄罗斯视为重要的现代化伙伴，认为双方应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地区冲突带来的挑战，提升在经贸领域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合作。^② 从 2013 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上看，俄罗斯希望深化与欧盟的经济贸易合作，主张与欧盟达成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基本协议，基于平等和互惠原则，促进“现代化伙伴关系”倡议的有效实施，并将与欧盟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作为长期目标。^③ 如图 2 所示，俄乌危机前后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出现明显下滑。基于图 2 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整体上进展顺利。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乌之间的政治分歧演化成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政治经济斗争，这不仅使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风险骤增，^④ 也使俄罗斯作为“持久稳定能源供应国”

^① 参见“Bulgaria Suspends Work On South Stream Pipeline”, Radio Free Europe, 2014-06-08, <https://www.rferl.org/a/bulgaria-suspends-work-on-south-stream-pipeline/25414739.html>, 访问日期: 2023-10-11; “G8 Summit ‘Won’t be Held in Russia’”, BBC News, 2014-03-24,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26722668>, 访问日期: 2023-10-11。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Russia Launch New Partnership for Modernization”, IP/10/649, Brussels, 2010-06-0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0_649, 访问日期: 2023-08-25。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3, Законы, Правила и Полож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3-02-12, <https://legalacts.ru/doc/kontseptsija-vneshnei-politiki-rossiiskoi-federatsii-utv-prezidentom/>, 访问日期: 2023-08-25。

^④ 陈小沁:《解析乌克兰危机下俄欧能源合作的困境与趋势》,第 50 页。

这一角色的可信性受到质疑,极大影响了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发展。总体而言,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在成长时期的前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双方的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均发生了变化,使得仅靠这一机制调整并扭转双方关系不利发展趋势的作用有限。在能源对话机制演进的过程中,能源战略与国际危机这两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从能源战略看,欧盟进行了两次东扩:2004年,10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2007年,两个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扩员后的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更为复杂。正如前文举例所示,俄欧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因波兰反对而搁置。从国际危机看,俄格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明显对双方的角色期待产生了负面效应。本文指出两个影响因素,并不是指明谁占主导或二者互为因果关系,而是将它们看作并列要素,认为它们共同对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运行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三)停滞时期

从2014年至今,俄欧能源对话陷入停滞的困境,双方在能源合作上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双边关系以冲突为主。

乌克兰危机后,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俄罗斯不再是欧盟的战略伙伴。^①自此,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向东转”,逐步失去了成为欧盟主要的经济、贸易与外交重要伙伴的角色期待,将自身定位为欧洲秩序扩张下的受害者。^②因此,在能源贸易上,近年来俄罗斯加强了对中国、印度等国的能源出口。俄罗斯已计划修建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能源管线,预计每年可向中国增加500亿立方米的管道天然气供应,^③这将有助于俄罗斯实现其能源出口的多元化和平衡化,降低因对欧洲市场的过度依赖而产生的风险。在这一时期,欧盟也逐步对发展新能源进行了探索。2015年,欧盟能源联盟成立,以降低欧盟国家在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依赖。《巴黎协定》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后,欧盟希望利用新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和“碳中和”目标来推进其清洁能源战略,重构其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对此,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发布《欧洲氢能战略》(EU Hydrogen Strategy)及《能源系统一体化战略》(Energy Systems Integration Strategy),宣布

^① “European Union and Russia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https://eeas.europa.eu/archives/docs/russia/docs/2011_eu-russia_leaflet_en.pdf, 访问日期:2023-09-03。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6,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016-11-30, <http://kremlin.ru/acts/bank/41451>, 访问日期:2023-09-05;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3,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023-03-31,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访问日期:2023-09-05。

^③ “Russia Finalising Power of Siberia—2 Gas Pipeline Route to China, Novak Says”, Reuters, 2023-09-0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russia-finalising-power-siberia-2-gas-pipeline-route-china-novak-2023-09-06/>, 访问日期:2023-10-11。

在 2050 年前实现三步走的渐进式发展,^①为欧洲未来 30 年清洁能源特别是氢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22 年的俄乌冲突引发了欧洲国际社会的严重危机,促使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动议,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②导致俄欧关系降至冰点。这进一步影响了俄欧能源关系,使得欧洲的能源系统面临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措施来应对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方面的挑战。一类旨在减轻能源成本上升对消费者和企业的负面影响,另一类旨在稳定和降低能源价格并确保能源安全。具体表现为:2022 年 5 月,欧盟正式公布转型行动方案“欧盟能源重振计划”(REPowerEU),要求加快可再生能源产能部署、能源供应多样化和能效的提升。^③ 2023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公布《净零工业法案》(Net-Zero Industry Act),要求提高欧盟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竞争力,帮助欧盟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目标。^④

然而,在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方面,欧盟能源梦想的实现仍面临两大阻力。首先,尽管俄乌冲突后,欧盟就减少对俄能源依赖上达成一定的共识,^⑤但欧盟内部在应对举措上依旧缺乏一致性。欧盟内部成员国围绕能源问题的分歧集中在供应转向和结构转型两方面。^⑥ 在供应转向方面,各国在能源需求和转向能力上的差异,不仅直接反映在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目标、范围和程度等方面的分歧上,而且反映在财政投入上的相互制约中。例如,德国推出总额为 2000 亿欧元的能源补贴计划,招致多数欧盟国家的强烈批评,它们认为德国无视了其他国家的财政能力和有关政策对欧洲能源市场的冲击效应。在结构转型方面,一些国家重新启用煤电

^① 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Hydrogen”,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energy-systems-integration/hydrogen_en, 访问日期:2023-10-11; European Commission, “EU Strategy on Energy System Integration”,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energy-systems-integration/eu-strategy-energy-system-integration_en, 访问日期:2023-10-11。

^② “European Parliament Declares Russia to be a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21118IPR55707/european-parliament-declares-russia-to-be-a-state-sponsor-of-terrorism>, 访问日期:2023-09-05。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werEU at a Glance”,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repowereu-affordable-secure-and-sustainable-energy-europe_en, 访问日期:2023-10-11。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Net-Zero Industry Act: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to Climate Neutrality”, 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industry/sustainability/net-zero-industry-act_en, 访问日期:2023-10-11。

^⑤ 奥尔加·特罗菲缅科、邵鹏洁:《欧盟与俄罗斯关系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以能源贸易为例》,载《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102-123 页,这里第 108 页。

^⑥ 潘家华、董秀成、崔洪建、丁纯、严兵:《欧洲能源危机及其影响分析》,载《国际经济评论》,2023 年第 1 期,第 9-37 页,这里第 22 页。

或延长核电站运行时间,与欧盟的碳中和目标相悖,加剧了内部分歧。其次,欧洲受到美国能源霸权的制约。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议题上重新夺回国际领导权,通过《通胀削减法案》为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吸引了欧洲新能源企业前往美国建厂。国际能源市场的“阵营式分化”^①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能源转型动力。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贸易并未完全中止,这为未来俄罗斯与部分成员国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能。然而,俄乌冲突的局势仍未明朗,俄乌关系未出现缓和迹象,由此加剧了俄欧关系的紧张。政治和解的难度使得欧盟的能源转型仍然面临重重困难,欧盟需要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和挑战。总体而言,停滞时期反映的是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衰退,俄乌冲突后,西方国家对他经济制裁使自冷战时期就建立起来的俄欧能源关系迅速崩塌。双方角色定位中能源政策的调整受俄乌冲突的影响较大。

四、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进特点

在角色理论视域下,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本质上是“制约和调节俄罗斯和欧盟双向互动关系的制度性行为”,同其他安全性质的国际机制发展脉络类似,俄欧能源对话机制也在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的互动中,不断演化,有产生、成长、发展壮大、停滞甚至再重构的时期。总体上看,这一机制的演进过程中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 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进展程度是俄欧关系的主要反映

俄欧能源对话机制自产生以来,经历了萌芽、成长以及停滞三个时期,而俄欧关系也大致呈现出以合作为主、合作与冲突并存以及以冲突为主的三种不同状态。如表4所示,俄欧角色互动推动着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运行。

在第一个阶段,1994年《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1997年正式生效)的签署确立了俄欧峰会这一定期制度性的长期磋商机制,这意味着欧盟将经济转轨的俄罗斯视作伙伴,且在总体上认同俄罗斯所进行的抛弃原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转向,也意味着俄罗斯的未来发展离不开与欧盟的广泛合作。在伙伴关系作为基石的背景下,2000年《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得以达成。总体来讲,这一阶段俄罗斯和欧盟之间互动的结果同彼此的角色期待有着较高的一致性,双方经历了不断克服地缘摩擦、摆脱历史桎梏、寻求双边合作的过程。俄罗斯希望欧盟成为重要能源合作伙伴,欧盟希望俄罗斯成为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国。在第二个阶段,从2001年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正式建立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欧能源合作总体上取得较

^① 冯玉军,张锐:《乌克兰危机下国际能源供应链断裂重组及其战略影响》,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3期,第17-35页。

表 4 冷战后俄欧能源对话机制中的角色转换

阶段与特征	主要官方文件	角色定位与期待	影响事件
萌芽期 (1994— 2000 年) 合作进展 顺利	1992 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 1994 年《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 1999 年《欧盟对俄罗斯共同战略》； 2000 年《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俄罗斯将自身视作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力量,是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角色定位);希望欧盟成为重要能源合作伙伴,成为自身国际地位的认同者(角色期待) 欧盟将自身看作西方先进制度的代表(角色定位);希望俄罗斯成为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国,并将俄罗斯视作西方价值观的扩张对象(角色期待)	两极格局瓦解; 俄罗斯对外政策向西方调整; 两次车臣战争
成长期 (2001— 2014 年) 合作与冲突 并存,对话 机制进程 放缓	2003 年俄罗斯《2020 年能源战略》; 2005 年有关建立俄欧四个统一空间“路线图”的一揽子文件; 2008 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 2010 年欧盟《2020 年能源战略》; 2010 年《现代化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011 年《2050 欧盟能源路线图》; 2013 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	俄罗斯将自身看成国际事务中西方的合作者,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角色定位);将欧盟视作自身重要的经贸伙伴,希望与欧盟共同重构欧洲秩序,推动欧洲共同安全和稳定(角色期待) 欧盟将自身视为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欧洲秩序中的一员(角色定位);将俄罗斯看作平等伙伴、现代化伙伴、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国,希望俄罗斯融入自由主义欧洲秩序(角色期待)	欧盟东扩;国际金融危机; 俄格冲突; 乌克兰危机
停滞期 (2015— 2023 年) 对话停止	2015 年欧洲议会的“对俄决议”; 2016 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 2020 年俄罗斯《2035 年能源战略》; 2022 年欧洲议会的“对俄决议”; 2022 年《欧盟外部能源战略》; 2023 年《俄联邦对外战略构想》	俄罗斯将自身视为自由主义欧洲秩序扩张下的受害者(角色定位);希望欧盟可以参与建构安全不可分割的欧洲秩序(角色期待) 欧盟将自身视为欧洲安全的“捍卫者”(角色定位);希望俄罗斯可以融入西方主导的欧洲秩序(角色期待)	俄乌冲突;欧盟内部分歧; 俄罗斯对外政策“向东转”; 美国“页岩气革命”

来源:作者自制。

大进展。双方达成的主要成果有两项:其一,2002 年 5 月,俄欧峰会正式成立“欧盟-俄罗斯一体化委员会”;其二,俄欧双方通过了关于建立俄欧四个统一空间“路线图”的一揽子文件,即统一经济空间,统一自由、安全和司法空间,统一外部安全空间,统一科教文化空间。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 2010 年双方发表《现代化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实质上是对俄欧既有合作内容的深化。现代化伙伴关系更为强调俄欧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和公民客观诉求,聚焦俄欧在统一经济体方面的合作。相较于前一个阶段,该阶段俄欧之间的关系过度依赖于能源贸易,在经贸等其他领域合作有限,这也从侧面显示出俄欧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并且,这一时期俄罗斯和

欧盟因合作理念和需求不同,双方关系受到大西洋关系、欧盟东扩、俄格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的挑战,双边的角色期待远达不到彼此预期,为后续的双边关系破裂从而导致能源对话机制陷入停滞埋下隐患。在第三个阶段,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是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可以说,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后,双方在角色定位上都朝着敌对的方向转变。在俄罗斯看来,自身是欧洲秩序不断扩张的受害者;^①在欧盟看来,俄罗斯作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同自身在意识形态上截然不同,必然不再是合作伙伴。

(二)政治文化差异下积极的角色期待难以达成

俄欧政治文化的差异影响着双方信任的建构,不利于双方在能源领域建立战略互信及合作的有效开展。文化上的不信任感决定了双方一开始达成的能源对话机制就具有脆弱性,且随时面临对话停滞乃至破裂的风险,而双方在实践中的互动则加深了对彼此的不信任。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和欧盟不断东扩,挤压着俄罗斯的战略和生存空间,俄罗斯认为西方没有尊重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西方国家所支持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也削弱了俄罗斯在中亚和独联体的政治影响。而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至冰点,欧盟对俄的一系列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造成了双方两败俱伤的局面。2019年,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加入北约和欧盟确立为乌克兰的外交目标,^②这一行为激发了俄罗斯的本体安全危机,^③进一步激化了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在欧洲秩序上的矛盾。由此可见,政治文化的差异使得双方互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在双方互动中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深,这对俄欧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俄欧角色定位的非对称性结构制约能源对话机制发展

俄罗斯和欧盟的角色定位具有非对称性特点,这种结构制约了双方能源对话机制的有效运行。其一,俄罗斯是一个主权结构高度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决策机制效率高,内部权力结构因为分歧而相互掣肘的可能性较小。欧盟则是一个通过成员国主权有限让渡构成的一体化国际组织,是一个准国家,其内部决策

^① 《Россия дала упреждающий отпор агрессии》: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утина на параде Победы в Москве 9 мая, <https://sib.fm/news/2022/05/09/rossiya-dala-uprezhdajuschij-otpor-agressii-polnyj-tekst-vystupleniya-putina-na-parade-pobedy-v-moskve-9-maya>, 访问日期:2023-10-09。

^② Верховная Рада Внесла Изменения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Закрепив Курс Украины на Членство в ЕС и НАТО (фото, видео), Київ Влада-Новини Києва та Облaсті, 2019-02-07, <https://kievvlav.com.ua/news/verhovnaya-rada-vnesla-izmeneniya-v-konstitutsiyu-zakrepiv-kurs-ukrainy-na-chlenstvo-v-es-i-nato-foto-video>, 访问日期:2023-07-28。

^③ 毕洪业:《从危机到战争:俄罗斯本体安全与俄乌冲突》,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21-54页,这里第21页。

机制层级多、结构复杂，内部协调和达成一致的成本高，行动效率偏低。其二，角色定位影响了双方的对外战略规划。欧盟对俄罗斯的合作安排和设想更为整体和长远，欧盟希望欧俄能源对话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并为深化政治合作树立榜样。欧俄能源对话也可以深化能源合作并逐渐外溢到经济、政治领域，最终实现西欧和俄罗斯的一体化。但是，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完全不同于西欧国家，也无意复制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路径，对于全方位的一体化追求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和经贸方面的合作，希望通过能源外交恢复昔日大国地位，对于双方的合作俄罗斯也并没有提出较为长远的规划。其三，从欧盟与其内部各成员国职责分配关系来看，欧盟主要负责其内部能源市场的自由化及运作，修建连接所有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各成员国则有权确定自己的能源平衡结构，保障自身能源安全和决定本国自然资源开发的程度。^①由此可见，市场范式在欧盟层面（主要指代表欧盟整体利益的欧盟委员会）有较大影响，而地缘政治考量则更多地体现在国家层面。

欧盟的能源安全问题以国家间协调为基础，欧盟成员国对此拥有否决权；而与第三国的对话，包括有关能源安全问题的对话则主要由欧盟对外行动署领导，该机构倾向于采取将能源与政治相结合的地缘政治范式。这主要是由于欧盟东扩后其内部形势发生变化，围绕能源政策的制定主要形成了三方面影响因素：其一，以德国为代表的、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部市场来保证能源安全的成员国不赞同大量限制与俄罗斯的双边协议。比如，在俄乌冲突前，德国对外能源关系的重点是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对话与合作，^②德国表示，过大幅度地削减对俄罗斯能源的采购将导致经济衰退。^③其二，以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新入盟国家，在欧盟对外行动署内主张欧盟应该以更一致和更强势的政策给俄罗斯施加压力，并积极追求能源替代方案与新能源计划。其三，以法国为代表的、兼顾地缘政治和能源市场的成员国主张与俄罗斯在能源问题上采取一系列的务实对话与合作，缓冲短期内能源安全的压力。总之，俄欧角色定位的非对称性的结构矛盾限制了能源对话机制提升的空间。

^① 陈小鼎：《欧洲能源联盟建设及对未来俄欧能源关系的影响》，载《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2期，第44-58页，这里第51页。

^② 连波：《欧盟对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安全化与安全化困境》，载《德国研究》，2022年第5期，第25-47页，这里第40页。

^③ Еврокомиссия заявила об обсуждении санкций на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РБК, 5 апреля 2022, <https://www.rbc.ru/economics/05/04/2022/624c3edf9a7947648069a0fb>, 访问日期:2023-09-09。

五、结 语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降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双方信任崩盘,基础协议的谈判遥遥无期。未来,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恐将难以重启,能源关系对话机制可能围绕俄罗斯与部分欧盟成员国间的磋商进行。

首先,俄乌冲突阻碍了俄欧互动形成的角色期待。双方都未能朝着各自期待的方向转化,这使得本身就处于停滞时期的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更加难以重启。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是底线。欧盟不断东扩挤压了俄罗斯的空间,当被视为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世界”起源的乌克兰将要彻底离去时,俄罗斯面临着本体论的安全威胁。^① 在欧盟看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举动从根本上挑战了欧盟对欧洲整体、自由与和平的愿景,表明了欧盟和俄罗斯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地缘政治视角,决定了欧盟和俄罗斯关系的不可逆转。^② 这是双方对战略空间的安全认知差异所致。进一步来说,俄欧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冷战后的欧洲秩序,并且双方在处置冷战遗产时立场迥异。

其次,欧盟想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愿景与其现有能力不相匹配。比如,能源危机背景下国际能源署向欧盟各国政府提出了10项可减少燃油需求的行动^③,以及前文提到的“欧盟能源重振计划”。然而,从现在到2027年,实现“欧盟能源重振计划”目标还需要额外投资2100亿欧元。^④ 另外,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对欧洲的能源市场具有一定的冲击。^⑤ 考虑到欧盟各成员国页岩气储量不同、开采技术难度的差异、环境保护的需要、资金投入的困境以及进口美国页岩气的运输成本等多方面影响,就现阶段来说,俄罗斯能源供应国的身份短期内被替代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页岩气革命”引发的欧洲新能源革命仍值得未来进一步观察。

最后,俄罗斯可能推动“议题脱钩”以重塑俄欧非敌非友的关系定位。^⑥ 在能源合作对话机制方面,俄罗斯将以“一对多”的多元化模式逐步替代“一对一”的

① 毕洪业:《俄罗斯外交战略与对外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21年版,第216页。

② Richard Sakwa, “The Future of EU-Russia Relations”, <http://www.institutfuersicherheit.at>, 访问日期:2023-09-15。

③ “A 10-Point Plan to Cut Oil Us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2-03-16, <https://www.iea.org/reports/a-10-point-plan-to-cut-oil-use>, 访问日期:2023-10-11。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REPowerEU Communication”, 2022-05-18,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2_3132, 访问日期:2023-10-11。

⑤ 富景筠:《“页岩气革命”、“乌克兰危机”与俄欧能源关系——对天然气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分析》,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82-98页,这里第83页。

⑥ 赵隆:《跨大西洋关系重塑背景下的俄罗斯对欧政策调整》,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6期,第84-108页,这里第84页。

单一模式。相较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老欧洲”国家，以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为主的“新欧洲”国家受历史包袱影响，排俄反俄的立场更为坚定，使得欧盟层面与俄罗斯开展能源对话合作的可能性较小。但在国家层面，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在与俄罗斯能源合作问题上保持审慎甚至积极态度，故俄罗斯可选择淡化俄欧间的“敌我”角色观念，适度支持欧盟的战略自主定位，努力推动“一对多”的能源对话平台建设。

本文尝试运用角色理论来分析俄欧能源对话机制的演进历程，力求揭示其中的影响因素与演进规律。结合上述三点分析看，笔者认为，在欧洲秩序博弈的大背景下，俄欧能源对话机制在欧盟层面重新开展的可能性较小。但是由于欧盟国家内部利益的不一致，俄罗斯更容易同部分欧盟成员国单独建立较为有效的合作机制。本文对未来的研究提供了至少两点参考价值：第一，进一步细化欧盟内成员国对俄能源合作的态度，分析成员国的类型及其扮演的角色，有助于俄罗斯对多个成员国集团进行能源合作的应用型研究；第二，从角色理论、国际规范、本体安全角度出发，考察陷入停滞的安全机制如何转型等问题，进而丰富了国际机制论的相关研究视角。

但受制于理论和关键变量选择，本文在未来研究中仍有进一步挖掘空间。一是角色理论分析对于俄欧能源对话机制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如文章第一部分所言，角色理论常用于分析国家间的关系与外交政策，但理论创建者以及后来推动者都未能从理论中找寻出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变量来说明国家间的互动变化，只能分析出诸多因素以及不同时期哪些因素更为关键。二是本文引入了政治文化概念，但是作为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结晶，欧盟内部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性。将欧盟整体政治文化与俄罗斯政治文化差异进行对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欧盟内部不同国家之间在价值观、文化传统方面的异质性，尽管本文在研究假设中规避了这一问题，但仍需要指出欧盟内部文化传统有异质性，比如西欧的法德两国与中欧的匈牙利等国就存在巨大差异。政治文化也很难进行概念操作化，测量难度很大。

责任编辑：郑春荣